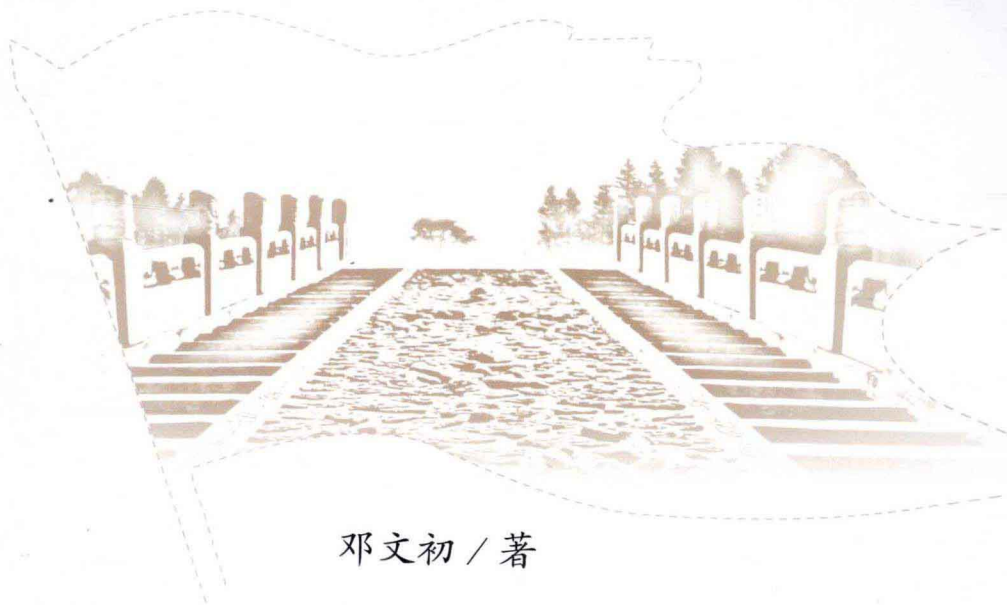




邓文初 / 著

民族主义之旗

革命与中国现代政治的兴起

MIN ZHU ZHUYI ZHI QI
GEMING
YU ZHONGGUO XIANDAI
ZHENGZHI DE XINGQI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民族主义之旗

革命与中国现代政治的兴起

邓文初 /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民族主义之旗/邓文初著.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620-4830-5

I. ①民… II. ①邓… III. ①民族主义—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D092.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5897号

- | | |
|------|--|
| 书 名 | 民族主义之旗——革命与中国现代政治的兴起 |
| 出版发行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编 100088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010-58908325 (发行部) 58908334 (邮购部) |
| 编辑统筹 | 第六编辑部 010-58908524 dh93@sina.com |
| 承 印 | 固安华明印刷厂 |
| 规 格 | 650mm × 960mm 16 开本 16.25 印张 210 千字 |
| 版 本 |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620-4830-5/D · 4790 |
| 定 价 | 39.00 元 |
| 声 明 | 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 由我社负责退换。 |

Contents

目 录

➤ 绪 论	1
一、问题意识与选题意义 / 4	
二、学术史回顾与本书思路 / 12	
➤ 第一章 “中国问题”	25
第一节 帝国主义 / 28	
一、瓜分狂潮与中国保全 / 30	
二、资本输入与经济增长 / 42	
第二节 中国问题与日本因素 / 50	
一、政治变革与日本模式 / 51	
二、大亚细亚主义与日本战略 / 60	
三、日本化时代 / 70	
➤ 第二章 帝国与民族	93
第一节 “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 94	
第二节 “民”与“族”的冲突 / 101	
第三节 “中国”概念的分裂 / 116	
一、构想“中国”：历史与理想 / 117	
二、构造“中国”：理性与情感 / 124	
第四节 帝国崩溃与民族革命 / 138	
一、帝国困境 / 139	
二、革命困境 / 148	

➤ 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	163
第一节 革命党与“二十一条” / 165	
一、寻求外援 / 166	
二、“二十一条”的提出 / 167	
第二节 民族主义之旗 / 180	
一、“群众”运动之喧嚣 / 185	
二、革命者之歧声 / 197	
➤ 结 论	219
一、国际均势与中国问题 / 220	
二、民族主义与中国革命 / 227	
三、革命迷梦与革命反思 / 233	
➤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239

绪 论

20 世纪百年中国，东西交汇、风云激荡。西方的物质文明与思潮学理之输入，与中国政治改革与社会变迁相形影。坚船、利炮强势叩关，在崩析古老的华夷秩序之后，“资本”和“主义”的强势弥散，又击溃了这一古老秩序背后的道德伦常。国土的瓜分伴以精神的陆沉，于是，各种“主义”、各种“理论”、各种“教旨”蜂拥而来，成为知识分子与政治精英改造中国、推动社会前进的理论资源。思想潮流如水推沙、如风卷云，但真正能够打通中国社会的层级壁垒，吸引精英而又魅惑草根的思潮，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影响着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向；改造着中国的思想文化、社会风气；重绘了中国内地与周边的政治地图，其力量之巨，史所罕见。而对近代中国革命，其呼风唤雨之势，推波助澜之功，无有出其右者。然而，对于这一社会思潮的认识，却是见仁见智：褒扬者认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反应，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它在中国面临生存危机与文化危机的时代困境中，成功地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维护了国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将中华民族凝聚为统一的整体，功不可灭。而贬斥者则指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泛滥，延续了华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等传统力量，其反资本主义倾向、非理性色彩，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误国非浅，害民尤烈。两论可谓水火冰炭。论者或曰，“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1〕

〔1〕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载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03 页。又参见许纪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东方出版社 2000 年版。

史家有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思潮因其漫长的流程和广阔的流域,它几乎就是一部浓缩别裁了的中国近代史或思想政治史。”〔1〕

民族主义,作为百年中国的关键词,确乎是切入历史的金钥匙、把握现实的秘籍图。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种思潮的交汇与冲突、各种力量的纠缠与角逐、各种心态的激荡和裂变、各种行为的兴起与衰替,均可在其中找到一以贯之的线索。而启蒙与救亡之双重变奏、激进与保守之相颀相颛、反抗与建设之相辅相成、分裂与统一之相消相长,亦可以在其中得到经久弥新的索解。倘若不了解历史,就无法把握现实。不对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与政治运作有相当的体悟,就无法面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崛起的民族主义浪潮,更无法面对当代国际社会中国民族主义幽灵的再一次全球性扩散。如果没有对民族主义思潮的理论清理与历史建构,就无法理解国际冲突的加剧与国际格局的重组,无法认清我们身处的国际秩序与全球环境;没有对民族主义知识的积累与学理的娴熟运用,在世界论坛的话语争夺战中,我们的声音就将被淹没,而以强势话语为依归。所谓“中国”,也就成为强势话语中被诠释、被定义、被建构的“中国”;而我们自己的言说,又在对强势话语的如影随形的追逐中,成为强势话语的注脚。诠释能力的苍白与学术想象力的贫乏,埋下了中国迷失的根源。

然而,对于影响历史至巨、制约现实至深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学术界的关注却直至20世纪最后10年才渐起渐兴。其成果,无论就数量与质量而言,都与百年中国史无以相称。〔2〕这

〔1〕 唐文权:“绪论:大风起兮云飞扬——顺应世界大潮的东方激流”,载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2〕 例如,1993年时,朱维铮在《关于清末的民族主义》(载《二十一世纪》1993年4月号)中说:“关于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的研究,在中国的学术领域几近空白”。到1998年时,罗志田在撰写《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史学反思》一文中,还认为“专门的研究论文已为数不多,而专题著作更屈指可数”。在1999年的修正文本中,罗志田罗列了4部中文专著与1部英文专题论文集: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罗志田:《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此书后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1年)。英文专题论文集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一现象以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显然值得探讨。现实的与学理的因素，外在的影响与内在的障碍，在在须行清理。需要切实思考的是：其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究竟具有什么形态与特征？其理论背景与现实力量之源泉何在？其二，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中，民族主义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功能究竟为何？当代中国的疆域与政治现状真能在民族主义这一思潮中找到根源吗？其三，在百年中国的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民生维艰、现代化之歧途等乱象中，民族主义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综而言之，作为一种思潮与思想的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革命与国家转型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本书即以上述问题为引导，对近代中国革命与社会变迁、国家转型过程的关键时期（1895～1915年），民族主义思潮与思想的引入及其实践，与列强在华势力、日本对华战略以及清政府之自改革过程、国内知识分子的思想及政治运作之间的关系进行清理，对近代中国的革命起源以及国家形态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作史学分析，以期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起源与其政治后果作出切近的观察，并对所谓的“中国问题”做出理论解释。

Armonk, N. Y. : M. E. Shape, 1996. 罗志田的书目是不完整的，专著方面失收了罗福惠主编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专题论文集方面，对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出版的《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出版的《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金观涛、刘青峰主编），也没有注意到。2000年以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方面的专著及论文集渐多，如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杨思信：《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不一列明。有关民族主义研究情况综述，参见萧守贤：“近年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概述”，载《历史教学》2003年第3期；徐友渔：“民族主义”，载《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1期。国内学界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相对于海外中国学界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显得十分薄弱，而如果与西方世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成果相比，中国思想、学术界的工作，只能算作起步而已。海外中国学界有关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的不完全著作索引，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附录部分。有关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情况，参见Athena S. Leoussi editor, *Encyclopaedia of Nationalism*, Transaction Publishers, New Brunswick (U. S. A) and London (U. K.), 2001.

一、问题意识与选题意义

美籍华裔学者张灏曾将 1895 年至 1920 年代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他认为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合法性与儒家文化的合法性同时受到怀疑，政治秩序的崩溃继之以文化价值的危机，使中国进入一个社会、思想、政治变革的转型时期。^{〔1〕}这一转型时期又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生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时期。^{〔2〕}

作为思想史的分期，张灏的这种划分，无疑有其合理性。但仅就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意识形态并参与现实政治运作，尤其是作为一种国家建构的思想与实践看，中国国家的结构转型时期，却基本上集中在 1895 ~ 1915 年之间，也即大体上所谓的清末民初时期。这一时期是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并迅速进入政治运作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经历了由传统的文化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变的过程，经历了由天下主义到民族国家的转变途径，而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又引导着近代中国国家结构性转型的基本方向，并为它提供了思想力量与政治原则。因此，这一时期也是国家体制移植、创设、变革的时期，是各种政治制度在近代中国最为频繁的实验时期，同时也是国家疆域结构、民族结构与统治结构的震荡、变迁、重组与基本定型的时期。要把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诸多面相、理解近代中国国家转型过程的诸多因素及其复杂背景，这一时期，就是一个需要重点清理的关键所在。但就这一时期而言，无论是海外中国学界还是国内近代史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政治变革与革命的研究已然蔚为

〔1〕 参见〔美〕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载《二十一世纪》1999 年 4 月号；以及“转型时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思想的转变和改革运动”，“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以上三文俱载《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又参见〔美〕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 ~ 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2〕 〔美〕张灏：“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几点省思”，载洪泉湖、谢政谕主编：《百年来两岸民族主义的发展与反省》，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版，第 232 ~ 237 页。

大观，却往往忽视了国家结构转型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至关重要性；民族主义思想流变、激荡的研究汗牛充栋，而民族主义政治运作、民族主义在国家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影响却少被提起；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反帝革命的一面多被强调，而其作为近代国家建构原则与创造力量等方面却难入论题。为弥补这种疏漏与偏颇，本书主要从国家重建与结构转型的角度，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思想潮流、政治运作、民族主义革命及其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之间的关系，做比较全面的清理，以厘清历史的复杂面相，对影响近代“中国”国家形态变迁诸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做出初步的解释。

（一）海外学界提出的“中国问题”

“问题在大陆，提问在海外；现象在大陆，解释在海外”，^{〔1〕}朱学勤对中国学界的批判，尽管近乎戏谑，却是一针见血。民族主义研究的状况，正可以印证朱学勤这种半自嘲、半无奈的心境。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是在海外学者的问题意识与解释框架笼罩之下展开的。影响至深的是两个人物一个模式：哈佛学派第二代传人列文森、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及其“冲击—反应”模式。

在《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1953年）中，列文森提出一个假说：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就是由文化主义、天下主义向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转化过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是西方冲击的结果。在此后出版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1968年）中，列文森将这一假说概括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近代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心灵痛苦，都可以在他们放弃文化主义/天下主义而采用民族主义这样的精神断裂中找到原因。他们希冀借助民族主义这一西方工具，在“天下”的失败中夺回“国家”的胜利。^{〔2〕}天

〔1〕 朱学勤：“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载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2〕 〔美〕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下主义/国家主义的冲突，在列文森的论述中，与价值/历史的冲突、中国/西方的冲突、文化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的冲突是同构的，它们共同构成列文森编织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经线”。〔1〕

“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的命题，自然并非列文森独创，詹姆斯·哈里森也有过这样的观点，〔2〕但是列文森对此理论作出“最为精致、最具挑战性、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详尽阐述”，他并将这个时代视为“民族主义登上中国的舞台而文化主义则在无助中谢幕”的时代。〔3〕列文森的观点在西方中国学界反响颇巨，褒扬与批评之声俱起。〔4〕旅美华裔学者张灏更是以一部专著应对列文森。他从历史研究之外部观察与内部参与的方法论视角，批评列文森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作为“铁板一块”看待，指责其

〔1〕 孙隆基语，参见〔美〕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130页。

〔2〕 詹姆斯·哈里森（James Harrison）早在1969年就提出过文化主义/民族主义命题，他说：“传统中国人的自我形象，被定义为‘文化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前者是基于一份对共同的历史遗产以及一种共同信念的认可，而后者则建立在‘民族国家’这一近代观念的基础上。”参见〔美〕詹姆斯·哈里森：《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纽约市亨特学院现代亚洲研究所1969年版，第2页。对詹姆斯·哈里森观点的介绍，参见〔美〕詹姆斯·汤森：“中国的民族主义”，载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

〔3〕 〔美〕詹姆斯·汤森：“中国的民族主义”，载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页。

〔4〕 列文森命题的影响，可参见郑家栋：“列文森与《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代译序，载〔美〕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196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对列文森命题的批评，参见〔美〕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页、第271页注释1；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编织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些问题”，载《二十一世纪》1990年12月号；又参见〔美〕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130页；林毓生：“关于《中国意识的危机》答孙隆基”，载《二十一世纪》1991年2月号；〔美〕詹姆斯·汤森：“中国的民族主义”，载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研究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211页；〔美〕杜赞奇：“解构中国国家”，载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页。

“冲击/反应”模式的简单化倾向。〔1〕

学术研究中一个普遍现象是，一个新问题的提出或一个新范式的建立，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对学术所造成的冲击，其意义往往超出这一问题的解决。批评者由于后见之明，往往所见颇是，但却无以替代提问者提出问题及其陈述问题方式的巨大魅力。列文森的“天下主义/国家主义”二元结构解释模式，尽管一开始就遭到广泛的批判，但随着其著作的汉译，却迅速成为汉语界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追随范式。〔2〕

1992年，白鲁恂在《二十一世纪》发表一篇题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文章，对列文森的命题作进一步发挥。文章提出问题及其展开问题的方式，成为学术界重新讨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起点。

白鲁恂的文章从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角度展开，指出民族主义应该有明确的政治内容，它不能混同于部落主义、种族主义，也不可归结为文化、宗教、语言等归属感，而必须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相关联。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却始终处在“相对松散和缺乏意识”的状态，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是幼稚、空洞的”，是反现代化的。〔3〕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条约口岸所造成的二元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通商口岸制度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多方面的现代化，但也加深了中国沿海与内陆的差别，从而使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更形紧张。”〔4〕

在此后的讨论中，白鲁恂将其观点简化为一个更为通俗的命题，“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麻烦在于它身为不折不扣的一个文明体系却想混入民族国家之列”。中国的天下主义虽使中国免于罗马帝国式的崩溃，但却窒息了社会与民间的活力，因而，中国现代的民

〔1〕〔美〕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8～80页。

〔2〕如严昌洪、许小青的民族主义分析框架，就采用了列文森模式。参见严昌洪、许小青：《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225页。

〔3〕〔美〕白鲁恂：“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载《二十一世纪》1992年2月号。

〔4〕〔美〕白鲁恂：“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载《二十一世纪》1992年2月号。

族主义不是现代公民个体意识的表达，而是统治阶级强加于人的道德秩序。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要进入现代国家行列，必须创造一种“生机勃勃的民族主义形式”。〔1〕

这些命题的提出者，确乎是外来的，其建构问题的方式，也确实是一种外在视角，即使西方中国学内部也不否认它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但天下主义/国家主义、东方/西方、冲击/反应等模式，由于具有较大的操作空间与解释力，更因它简单明了的叙事方式，加上这一模式的提出与引进，正好与现代化成为中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同步，因而迅速被学界认同，并综合成为一种经典的“传统/现代化”二元对抗结构解释模式。这种被称作现代化模式的解释框架主导着西方世界观察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取向，并随着海外中国学的大规模汉译，以及学术交流的增加，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叙事语法。然而，这样的二元结构解释框架，会不会是一个“稻草人”，“一种未经分析的将现代化理论应用于中国的过时的阐述？或者是其他西方学术中据称是民族优越感的偏见”〔2〕？这种西方视野下的中国观察，能否对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现象做出历史的、有效的解释？西方历史框架之中建构的“中国”，会不会是一种变形了的“中国”？中国在这样的透视之下，会不会最终迷失了自己的形象？这些问题，西方的中国学界已经提出，并试图重建“中国视野”，中国的学界也对此做出了及时回应。〔3〕

〔1〕 Lucian Pye, “How China's Nationalism Was Shanghaied”, cf Jon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1996, 转引自张旭东：“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35~436页。白鲁恂的观点也为港台学者如金耀基等所认同。参见洪泉湖、谢政谕主编：《百年来两岸民族主义的发展与反省》，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页。

〔2〕〔美〕詹姆斯·汤森：“中国的民族主义”，载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

〔3〕西方学界中国问题研究的转向，参见〔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美〕黄宗智编：《中国研究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国内回应情况，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这种东西互动中的学术语境及其问题意识，为本书的展开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思想背景。

（二）中国学术界的应对

对海外中国学以上问题的应对，是在对西方现代化思潮与理论的反思中提出的，主要学术对话者是中国的“后学”群体，以汪晖为领军人物。汪晖指出，现代性本身是一个悖论、一个矛盾结构。近代中国历史，在其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中，始终存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可以说，“‘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是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1〕在《关于现代性问题问答》一文中，汪晖强调现代性的冲突结构是现代性力量的源泉。于是，反现代性的中国民族主义，作为这一对抗结构中无法剔除的组成，获得了合法性。

积10年之力推出的《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是汪晖对西方中国学问题的一个整体回应。这部一千六百多页的著作，要解决的问题是所谓的“中国问题”，而中国问题，在其全部叙述中，始终又与民族主义缠绕在一起，无法单独分离出来。因此，对汪晖著作的简单分析，可以大致明白“后学”视野之下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整体形象及其与近代中国国家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

在后现代视野中，“中国”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对西方史学叙述体系的挑战，在作为世界历史的欧洲史框架中，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帝国与国家、天下主义与民族主义等二分概念体系是同构的，在地理与文明、人种与政治等区域性空间概念，可以直接转化为以单线进化模式为主体的时间概念，但是，这种二分化的话语体系已经无法解释“中国”这一实在：其一，与所有前现代帝国相比，中华帝国的规模及其稳定性是罕见的；其二，在21世纪，中国是这个世界唯一的将19世纪帝国的幅员、人口和政治文化保持在主权国家和民族范畴内部的社会；其三，与所有帝国分裂为主权国家的形式不同，中国近代的民族运动和国家建设

〔1〕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天涯》1997年第5期。汪晖此文又收入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将 19 世纪混合型的普遍主义帝国体制的若干特征和内容直接地转化到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之中。对于欧洲历史，中国是一个例外，中国的国家类型，是一种必须重新厘定的类型。〔1〕

在这种“中国例外”的视野中，汪晖提出几个有待解释的问题，为什么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的进程没有产生在其他帝国中几乎无法避免的解体？却能成功地将帝国遗产转化为革命与建设的要素，从而在帝国自身转化这一基本形态中建构新的主权？前 19 世纪的帝国与 19 ~ 20 世纪的国家架设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等等。〔2〕

在汪晖看来，作为一个西方概念，“民族主义”已经无法解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国”是什么？在西方的现代、后现代的话语中，均未得到有效的阐述。现代化视野中的近代中国，是由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中国，但显然，近代中国并不是西方视野中的民族国家，后现代视野中的中国，是一个“帝国”，同样，“晚清帝国”这一概念也是西方民族国家理念的构想物。“中国”是什么，它已经超出西方学术话语的解释力，只有回到中国自己的历史与话语中，才能找回“中国”之本真。因此，“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从西方引进的政治思潮与政治运动，其正义性失去了绝对性，政治正义必须纳入本土历史与现实中，接受双重检验。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观察中国与叙述中国历史的方法，其合法性也受到了质疑。观察方法与叙事语法背后，是作为知识——权力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的展现，以“民族主义”叙述近代中国历史，其实是一种无视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文化霸权主义行为。

柯伟林曾说过，“1912 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所继承的，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历史中国’，而是一个庞大的清帝国——它的多民族和多文化的扩张包括了满洲、蒙古、新疆、西藏以及其他

〔1〕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 1 部），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21 ~ 22 页。

〔2〕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 1 部），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21 ~ 22 页。

一些地区。”〔1〕近代中国的国家形态确实不是学界所认为的西方民族国家，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帝国”，而是具有强烈连续性的历史——文化实体，这一实体的存在，本身就对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尤其是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形成挑战，“中国”这一国家形态的出现，于是就必须得到解释，“中国”历史连续性如何可能？民族主义革命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影响近代中国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因素有哪些？它们如何发生作用？

（三）选题意义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尤其是由于“中国现象”的存在，冲击着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解释效力，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研究就必须改换思路，不仅要就这一思想引入近代中国的背景与过程进行分析，更需要对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民族主义时的国家状况、政治状况、社会背景、社会阶层、理论语境等方面进行分析，将近代中国思想界在接受这一思潮过程中的思想调整、话题转换、理论创造，及所呈现出来的历史意识与现实关怀纳入考辨之中。也就是说，要在理论旅行的过程中研究近代民族主义思潮进入中国的全过程，而不是将“民族主义”当成一个自明的思想体系加以认定。要将民族主义以及民族革命放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框架中，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化——“世界在中国”与“中国在世界”——这双重视野中，考察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运动、民族革命及其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贡献。

在这一视野下，本书的选题具有以下理论创新与问题开拓意义：

1. 将近代中国的国家转型过程作为研究重点，探讨影响近代中国国家转型过程中诸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尤其关注列强在近代中国力量均势存在的影响，对近代中国国家转型过程中的连续性之谜做出解释，破解“民族主义拯救中国”的神话，祛除政治浪漫主义的光环，让“政治史”研究回到“政治”自身的逻辑之中。

〔1〕〔美〕柯伟林、陈意新：“认识二十世纪中国”，载《二十一世纪》2001年10月号。

2. 在国家建构的角度，即在民族主义自身的价值体系中，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运动，尤其是民族革命的政治后果做新的考量。而放弃在革命价值框架之下考量革命这样的逻辑循环。在方法论上突破历史研究的意识形态牢笼。

3. 将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放回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进程之中，在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角度考量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使思想史落到政治史的实处，避免了思想史研究从概念到概念的虚空运作，也摆脱了思想史研究容易陷入的话语圈套。

4. 在革命史研究、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近代化研究、外交史研究以及政治制度史研究等专题研究方面，学界往往将视角集中在这一时段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如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十一条”等，在研究方面形成一个个相互隔离的区域，各研究领域之间无法沟通，历史的连续性因而被研究者强行切断，这种学术隔离的存在，不仅影响学术本身的发展，同时也是对历史的阉割。即使就个别历史事件而言，由于这种条块切割，也严重影响着对这一事件的理解。尽管在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段展开专题研究，会直接影响到本书结构的完整性，而且在学术研究越来越走向专门化的当下研究环境中，做这样的“整体”研究有违学术精深、专题化走向，也必然会留下诸多缺陷与漏洞，但却只有在这样的“整体研究”中，才能相对完整地把握一段历史。而本书所采用的多学科取径研究方法，也是从多侧面把握这一段历史的必要手段。

二、学术史回顾与本书思路

正如笔者在最近合作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一样，中国学术界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从研究方法而言，学界多注意文本的解读，而较少关注文本之外的政治运作；就研究所及的层面而论，学界多亲和思想史的面相，而相对忽略现实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似有淡化民族主义实践品性的倾向。”〔1〕近代中国民族主

〔1〕 参见郭世佑、邓文初：“民族主义的裂变——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的分析”，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